

主编 方克立

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意识的力量

——太虚唯识学思想研究

李广良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主编 方克立

20 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心识的力量

——太虚唯识学思想研究

李广良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识的力量:太虚唯识学思想研究/李广良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1
ISBN 7-5617-3556-1

I. 心... II. 李... III. 太虚(1890~1947)—唯识宗—思想研究 IV. B9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09959号

心识的力量

——太虚唯识学思想研究

著者 李广良
责任编辑 李惠明
责任校对 周起锐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门市(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业务电话 上海地区 021-62232873
 华东 中南地区 021-62458734
 华北 东北地区 021-62571961
 西南 西北地区 021-62232893
业务传真 021-62860410 62602316
<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印刷者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32开
印张 10.5
字数 267千字
版次 2004年9月第一版
印次 2004年9月第一次
印数 3,100
书号 ISBN 7-5617-3556-1/B·197
定价 17.00元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总 序

风云激荡的 20 世纪即将成为历史,新的世纪即将来临。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20 世纪“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中,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第三次是改革开放,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这三次历史巨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世纪之交,深入研究百年巨变的丰富内涵和历史进步的本质,系统总结本世纪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各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为 21 世纪新的奋进指出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是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重大课题。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方面共同努力、

分工协作来完成。其中,总结和反思百年中国的精神历程,对20世纪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作一番系统的总结、反思和自我批判,是这个大课题中的一个子课题。积极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是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理论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全部文化又在哲学中得到集中体现。一般来说,哲学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变迁是同步的,因此,20世纪中国的三次历史巨变,自然地也就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发展阶段性的基本标志。考虑到哲学和思想文化发展还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我们可以大致地把20世纪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思想论战是这个时期哲学、文化的重要内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哲学则是这个时期中国哲学的最高成果。第二阶段是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个时期,中国思想界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三足鼎立、对立互动的局面,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证明了真正代表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不是别的,它就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第三阶段是从建国初到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成为立国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大陆得到广泛传播和普及,推动了各方面事业的发展。但对它的简单化、教条化理解也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和 innovation。这一时期,在台港地

区,哲学和思想文化发展则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三民主义哲学、天主教的新士林哲学、当代新儒家和各种西方哲学与文化思潮都各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第四阶段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注意与当代实践和科学发展相结合,注意吸收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合理因素来丰富自己,表现出了新的蓬勃的发展生机。这二十年也是海峡两岸以及中外哲学与文化交流互动最活跃的时期。所有这一切,构成了“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基本内容,无疑都应该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之内。

我有这么一个看法,在世纪之交以至21世纪初的十年、二十年内,我们固然需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作整体性的宏观审视和研究,弄清基本的学派分野,揭示其发展大势、规律和特点,总结出对后世有益的经验教训。但做好这一工作的前提,是必须对这一百年来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所涉及到的主要人物、著作、思潮、学派、问题、论战等各个方面,有比较全面和具体、深入的了解,掌握基本的思想史实,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因此,相对于整体研究来说,扎实的个案研究可能具有更加基础性的意义。我认为,在目前条件下,要写出一部成熟的、有深度的20世纪中国哲学史或思想文化史来,时机尚不成熟,因为许多基础性的工作还没有做过,一些重要的研究空白还需要填补,尤其是关于后五十年的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史,研究基础更加薄弱。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本套丛书不着眼于宏观审视,而是拟就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

化思潮、学派、人物、著作、刊物、社团、问题、学说、论战、事件等一个一个具体课题,展开多层面、多角度的个案研究,力求从第一手资料出发,研究有一定深度,基本上能把所涉及到的问题讲清楚,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为此,我们初拟了一百多个题目,如能通过大家的努力分工合作做出来,那就为总结 20 世纪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基础性的工作,其价值自然会在新世纪的学术发展中显示出来。

在批判总结工作中,我们还会碰到一个学术立场、观点、方法的歧异问题。事实上,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当代新儒家都在做 20 世纪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的清理、总结和回顾工作,由于学术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学者们不仅在总体上对前后两个五十年、对后五十年中的“前三十年”和“后二十年”的评价有不同看法,而且在涉及到一些具体人物、著作、思想学说、论争的分析评价时,意见分歧尤大。在世纪之交出现一个批判总结的高潮,“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有思想的对立和交锋,亦可收互动互补之效,这是很自然的正常的现象。本套丛书力图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原则和方法,来批判总结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积极参与世纪之交的思想互动,为推进中国学术发展尽我们的一份力量。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套丛书是在几位中国哲学史界老前辈的指导下,组成了一个主要由国内十个中国哲

学专业博士点中的中青年教授参加的编委会,他们分别联系的作者,大部分是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学者。年轻人精力充沛,思想敏锐,富有开拓创新和探索的精神。我们要求各位作者在详尽占有资料、准确理解原著的基础上,用正确的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述,力求有所创新,有所突破。至于学术风格则不强求一律,可以各有特色,各尽其长。毋庸讳言,由于各位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学识水平不同,研究能力和所下的功夫不同,各书的水平也难免参差不齐。我们真诚地希望得到专家、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承担了本套丛书的出版任务,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深表感谢。

方克立

2000年3月5日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太虚佛学思想总论	8
第一节 近代佛学史的开端	8
第二节 太虚的生平与事业	10
第三节 太虚思想的特点	15
第四节 近代唯识学概说	20
第二章 太虚与法相唯识学	26
第一节 太虚唯识学思想的分期	26
第二节 太虚唯识学思想的特点	30
第三节 三系唯识学的比较	38
第三章 唯识与判教	52
第一节 判教智慧及其近代发展	52
第二节 第一、二期判教中的唯识学	57
第三节 第三期判教中的唯识学	74
第四节 世界文化判摄	82
第四章 唯识与《楞严》	90

第一节	《楞严经》与近代佛学	90
第二节	唯识与《楞严》的会通	94
第三节	《楞严》十义	103
第五章	唯识与《起信》	113
第一节	《起信论》的近代境遇	113
第二节	系统佛学中的《起信论》	120
第三节	《起信论》的唯识学阐释	124
第六章	唯识与法相	137
第一节	法相与唯识辨析	137
第二节	法相唯识分宗之说	140
第三节	“法相必宗唯识”	143
第七章	“新的唯识论”	154
第一节	“新的唯识论”的提出	154
第二节	《唯识三十颂》新解	163
第三节	法相唯识学的基本问题	173
第八章	佛法与现实	188
第一节	佛法与现实	188
第二节	能知与所知	194
第三节	四现实观	199
第九章	佛法与人生	206
第一节	人生佛教	206
第二节	人生的唯识分析	209
第三节	佛法与人的自由	215

第十章 佛法与革命	228
第一节 佛教革命	228
第二节 革命观	233
第三节 社会政治观	237
第十一章 佛法与新文化	246
第一节 文化思想	246
第二节 哲学	252
第三节 科学	261
第十二章 国学的唯识阐释	270
第一节 论《周易》	272
第二节 论荀子	280
第三节 论宋明儒学	286
结语	297
附录:马克思主义与 20 世纪中国佛学	300
主要参考文献	319

引 言

研究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与文化必然把我们引导到对 20 世纪的中国意识或中国精神的研究。所谓 20 世纪的中国意识或精神是一个由许多不同成分组成的整体结构,其中包含着三个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要素:首先是 20 世纪中国人的生命体验,当然主要是忧患与痛苦的经验;其次是传统的历史文化记忆,它顽强地保留在中国人的精神中,并在中国人的生存与实践活动中发挥作用;第三是西方传来的思想、观念与信仰,它不但影响和改变了中国人的社会历史实践,而且改变了中国人对世界的感知和理解,改变了中国人对自己传统的诠释方式,在中国人的意识和行为两方面都造成了历史性的改变。

研究 20 世纪的中国意识或中国精神必然把我们引导到对 20 世纪中国佛教的研究。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处于持续不断的动乱之中,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宗教信仰和文化思想也都因此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此一时期的中国意识或中国精神,也因而有极其复杂的结构。佛教不论是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还是作为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信仰体系,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许多受过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也皈依佛教的事实,即说明了这一点。十几年来学术界对中国近代佛教思想的研究成果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对中国近代佛学的研究,由于遵循的模式不同,因而得出的结

论也就迥异。在各种模式中,我对程恭让博士所提出的面向“中国佛教思想创造自身”的解释模式比较感兴趣。程恭让博士在用这一模式诠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尤其是欧阳竟无佛学思想方面取得了很突出的成就。这一模式的要点如下:

(一) 中国佛教的思想创造,乃是在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这一特定及前定的结构中,所进行的思想创造活动。中国文化及社会的背景,既是佛教思想的落脚点,又是佛教思想的生长点,佛教思想必然要不断地坎陷于中国文化,同时又必然会不断地解脱这种坎陷,回归佛教思想的自身;

(二) 由此,中国文化及社会环境中的佛教之“思想”,必然表现出两种思考的向度,一是“佛教化”的思想向度,一是“中国化”的思想向度,前者是要回归到佛教的固有精神或真实面目,后者则是要尽量应对中国的文化习性 & 社会境遇;

(三) 整个的中国佛教史或整个的中国佛教思想史,都是中国佛教思想创造的历史,亦即是“佛教化”与“中国化”这两种思想倾向,相互争对、此消彼长及互相配合、相辅相成的历史;

(四) 在任何一个具有独创性深度的思想家那里,都能发现在其佛教思想体系中,存在着两种思想倾向相互争对的痕迹,任何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佛教思想体系,都必然要表现这两种思想倾向的紧张与矛盾,也都必然要以一定的方式,针对这两种思想倾向之间的紧张及矛盾,提供一个解决之道;

(五) “佛教化”与“中国化”的矛盾,乃属不可避免之事,故在任一具体的佛教思想体系中,不免或是对“佛教化”的思想向度,或是对“中国化”的思想向度,表现出一定的偏颇甚或偏执;

(六) 无论偏颇或偏执于何种思想创造的倾向,却均是在“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这一特定及前定结构制约下,中国佛教思想活动的自身必具之义,因此也即应当从中国佛教思想活动的这一内在机制出发,来公允客观地解析具体佛教思想体系的功过是非及

成败得失。

这一模式根据“佛教化”与“中国化”之间的内在张力来解释中国佛教思想的历史发展,确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在在我看来,这一模式用来解释中国古代佛教思想是充分的,用来解释中国近代佛教则不够充分。近代中国的生存境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思想文化创造活动的历史前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历史上的佛教输入不同,近代中、西方文化根本不是处在一种对等的地位。中国人起先是多少有些无可奈何地和被迫地接受了西方文化,随后认识到西方文化的优长之处,即开始有意识地全方位模仿西方人,试图用西方式的方法赢得对西方的独立和自由。这便是所谓的“近代化”道路。遗憾的是,在器物、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全面走西方的道路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民族都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是无法抛弃的。像中华民族这样古老的民族,就更不可能抛弃往昔的一切而重起炉灶。“全盘西化”论者的主观意图或许有可取之处,但在实践上是根本不可行的,除非把中国意识中的中国成分连根端掉。然而,学习西方以求发展看来也是势在必行的。中国政治和文化中的腐败和弊端看来也只有采取西方人的方法才可以对治。最终,具体、历史的生存战略之争却表现为文化上的“古今”、“中西”之争。据此考察中国近代佛教的发展,其中除了传统上一直存在的“佛教化”与“中国化”的内在矛盾以外,必然还有一个“传统化”和“近代化”的内在张力。也就是说,在近代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佛教思想创造,除了受“中国化”与“佛教化”两种思想向度互相争对的机制制约之外,还必然受到“传统化”与“近代化”两种思想向度互相争对的机制之制约。

佛教自传入后,就一直是中国的精神结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成分。到了近代,西方的宗教信仰和思想观念的传入没有也不可能把佛教从民众的精神世界中驱除出去,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中国佛教的自我意识。以杨仁山为首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致力于

佛教的复兴运动,在广大的南方地区恢复了佛教信仰的生机与活力。他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基于个体生命完善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基于救国的需要。由于佛教的内容广泛而深刻,所以能够适应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精神需要。对广大普通百姓来说,佛教是苦难中的心灵寄托,是生存的希望和力量所在。对许多的知识精英来说,佛教不仅是消解个体生命压力的信仰,也是民族精神解放的工具。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佛教成了他们为国为民而奋斗的精神动力,佛教的思想构成了他们思想的主要内容。事实表明,佛教在恢复近代中国的主体意识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从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佛教发展史,是整个中国佛教史上最为丰富多彩的一页。在这个时期的佛教发展中,名居士和高僧们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杨仁山、欧阳渐、吕澂等为代表的大居士和以虚云、印光、太虚、弘一等为代表的大和尚们,以其坚苦卓绝的弘法活动,不但振兴了明清以来衰弊之极的中国佛教,而且使佛教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是佛教的思想家,也是佛教的活动家,他们的思想历程和人生实践,在中华民族的心态史和生命史上,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在近代佛教的高僧中,太虚无疑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极其重要、也极其特殊的人物,是一个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人物。他的旺盛的生命活力,他的侠情与才情赋予了那个时代的佛教以奇情异彩。他充分地认识到了近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期望使佛教在一个与传统中国完全不同的境遇中发挥其价值。他积极地进行佛教的改革运动,以期建立一个在教理、教制与教产上具有全新内容的新佛教,使佛教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使佛教的人世精神不再只是停留在玄理上。他以僧人的身份广泛深入地参与社会生活,与社会各阶层发生普遍的联系,一方面扩大

了佛教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深化了佛家的社会认识。太虚也具有多方面的丰富思想,除了佛学思想外,他对古今中外的各派思想和各种文化现象都极其关注,发表了许多评论世俗思想的文字。太虚的活动既体现了佛教的自我关怀,更体现了佛教对人间社会的关怀;太虚的思想既表现了佛教在近代社会的自我意识及其实践活动,又表现了佛教对近代社会及其实践活动的意识。同时,太虚的思想又具有中国本位的特点,他始终是站在中华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弘扬佛教的。

在太虚的佛教思想体系中,“传统化”与“近代化”的张力表现得特别明显。一方面,太虚的佛教背景是传统佛教的法系、学理和禅定训练,这使得他始终保持了对传统的忠诚;另一方面,太虚又受到新思潮的深刻影响,对新生事物充满热情,对传统佛教的弊端有清醒的认识,因而坚定地推动中国佛教的近代化改革。这使得他必须在传统与近代化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他的毕生事业就表现为在传统基础上通过改革来实现中国佛教的近代化的努力。他对自由、民主、科学、革命的巨大热情,表明了他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而他对中国传统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又表明了他思想中的传统性因素。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他都未能消弥“传统化”与“近代化”的矛盾。这是可以理解的。无论如何,太虚的思想和实践都深刻地揭示和表现了近代中国佛教的自我意识的矛盾。鉴于太虚的巨大历史影响和典型意义,本书以太虚的思想为研究对象,以期透过太虚对中国近代佛教思想有一个更为合理的认识。

学术界对于太虚思想的研究多集中于他的人生佛教思想。这固然是太虚思想中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太虚思想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方面。但我认为,仅仅关注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对太虚各方面的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与20世纪中国的其他思想家相比,太虚在深度和严谨性上也许稍逊,但在思想的

广度上,不但为一般的佛教思想家所不及,即是在世俗思想家中也少有人能与之相比。这一点是有重要意义的。20世纪中国思想的一个特性即是对生活世界的各方面的关注,尤其是政治社会的关注。而太虚对生活世界各方面的关注,至少在佛教僧人中是最为强烈的。他不但关注佛教的思想和实践的各方面,而且关注政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在他那里,对佛教的关注与对社会的关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本书从唯识学入手研究太虚思想。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中国近代佛学以唯识学为主要内容,唯识学不但构成了中国近代佛教的主要学理支柱,而且影响了近代中国哲学和思想的进程。以欧阳竟无为首的支那内学院、以太虚为首的武昌佛学院和以韩清净为首的北京三时学会,在唯识学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近代唯识学的三系。太虚一系的唯识学在价值取向、治学方法和佛法体系建构等方面与其他两系既有共同的特点,又有明显的差异。二、唯识学的学习和研究不但贯穿了太虚的几乎整个佛学生涯,而且还是太虚解释佛学各派思想和评价与阐释各种文化思想的工具。

太虚在佛学法系上并不属于唯识学派,他的唯识学思想因而也不是唯识学派的唯识学。太虚对唯识学的弘扬是出于契合时代机宜的考虑。因而,太虚的唯识学思想具有“新”与“融贯”的特点,在近代唯识学中独树一帜。“新”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用现代语言对唯识学进行新诠释。第二,唯识学的社会功能的新发挥。第三,用唯识学义理解释各种文化现象。“融贯”的含义是,他努力使唯识学与大乘佛学各宗融贯起来,一方面强调唯识宗与他宗的平等性,一方面又用唯识学的义理去阐释、充实和丰富他宗的思想。

本书把太虚的唯识学思想分为“融贯的唯识学”、“新的唯识学”和“应用的唯识学”。“融贯的唯识学”是努力融会唯识学与各派佛学思想的思想方法和致思趋向,涉及到唯识与判教、唯识与